

四季雁书

〔日〕井上靖 池田大作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日]井上靖 池田大作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四季雁书

主 编:[日]井上靖 池田大作 责任编辑:张雅莲

封面设计:马 葱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

标准书号:ISBN 7-206-00671-X/G·86

版 次:2005年7月第2版 印 次: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 000 册 定 价:18.4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友好及师生	池田大作 (1)
触摸“永恒”	井 上 靖(10)
武帝与霍去病	井 上 靖(17)
从一段狱中体验所想起的	池田大作(25)
“泷山节”及恩师户田先生	池田大作(34)
康德的话·青年们	井 上 靖(42)
追求烈日般的人生	井 上 靖(50)
“阿罗哈”精神和世界市民	池田大作(57)
关于生与死的联想	池田大作(66)
千利休·秋水·《化石》的创作背景	井 上 靖(75)
穗高·铁斋	井 上 靖(83)
人生的年轮·托尔斯泰的脸	池田大作(91)

在广岛的随想	池田大作(99)
老人问题·龙	井上靖(107)
富士·殡	井上靖(113)
俄罗斯的美术·佛教的生死观	池田大作(120)
大阪风格·周恩来战友	池田大作(129)
冲绳·达·芬奇	井上靖(137)
艺术家·学者	井上靖(144)
早春之赋·关于祈祝	池田大作(150)
毕业典礼·女性的生活方式	池田大作(158)
春·欧洲之旅	井上靖(166)
茶室的意义·记者时代的学习	井上靖(173)
儿童的花园·人性化的季节	池田大作(179)

友好及师生

地田大作

前 几天，我刚从中国访问回来，这是继去年6月的初访以及年底的再访后的第三次访华。现在已是深夜，当我独对书案写这封信时，旅行中邂逅的那些人的面影一下子都历历浮现在我脑海中。他现在正在做什么，而她现在又在想什么呢——当我沉溺于这般冥想时，突然体味到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一期一会之可贵及意义深远，同时也留恋地回忆起在中国的日子来。

北京4月的阳光亮得耀眼。我上次来时，柳树和杨树叶都已落尽，将它们那光秃秃的枝梢伸向冬日的寒空，而如今在阳光的沐浴下，这些树却已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新绿，有时甚而闪现出金色的光彩，再加上黄的迎春花、粉红的桃花、白的梨花——北京的街市一片缤纷色彩。

在这一片酣酣的春意之中，我意外地得到机会与柬埔寨

的诺罗敦·西哈努克殿下会见。据说“西哈努克”这个词是“狮子”的意思，这头蛰伏多年的“狮子”确实给了我鲜明而强烈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这次会见正好安排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收复金边并结束5年内战的消息发表后的第二天上午。在会见时，我们不可能不触及政治形势方面的问题，但比起这些话题本身来，倒是元首府会客室墙壁上挂着的一幅画更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一幅深蓝色基调的吴哥寺^①的画。

距今14年前的2月，我去过这吴哥寺的遗迹。在一片树海深处，突兀而现的塔、回廊和台阶构成了这片古迹。有人把它比作是高棉民族沉睡的遗产或神秘的微笑，而我觉得这与世隔绝的一隅本身便是悄然实存着的历史。我记得自己当时曾为此而沉浸于无限的感慨之中。

西哈努克殿下谈到他母亲病重的事，并以沉重的语气告诉我：他因此而不能马上回国，以后回国时，首先去的也许不是金边而是吴哥了。他似乎是已做好了失恃的思想准备，打算为了母亲的埋葬而回吴哥。在民族的胜利之日，却又要为母亲的危笃而悲愁——殿下这动人的形象使我沉浸于一种如同身受的情感之中。我久久地凝望着那幅蓝色浓郁的

① 吴哥寺：又名吴哥窟，位于柬埔寨古都吴哥城南，是世界闻名的佛教古迹，建于12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中叶后重新修整。

绘画。

在当时的谈话中，殿下谈了他与大国的干涉和压迫不断坚决斗争的体会：

“我已习惯于斗争生活，不管怎样的困难，也不可能使我感到疲惫。”

他吐露的这番不屈信念，使我看到了一位坚毅不拔、充满魄力的优秀领袖的形象。当时那一瞬间，闪现在我脑中的，既有那倾注着一个人全部身心的斗争，也有隐藏在其背后的那种人世间的悲哀。殿下不久后得到的定是民众那暴风雨般的欢呼，而如今萦回于我胸中的却是他在那一片静寂的会客室中，独自在吴哥寺的画前沉浸于对母亲的思念之中的形象。

西哈努克殿下始终带着微笑与我谈话。在朝着民族自立方向而去的滔滔历史奔流中，那神秘高棉的微笑，如今已变成一种苏醒过来并充满生气，带着自信与矜持的微笑。这微笑始终不曾因岁月的流逝或历史的变迁而消失，而是永久地深藏于民族的心底，一旦到艰难困苦之时，它便点燃了民族的生命之火，而今更是迸发出新的能量，使得民族的形象大放光彩。

“我总有一天会来的！”——我使自己的想象驰骋于与殿下的再会之日。我希望我们的重逢之地不是政治中心金边，而是蕴蓄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吴哥，但不管是在哪儿相会，我都始终期望那时自己能作为这世界上的一庶民，而殿

下也作为生长于柬埔寨的一位世界性的人物，我们俩都作为朋友而畅谈人生。

这次是我第一次访问武汉。与北京之间 17 个小时的火车旅程，使我再一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广袤。不管走到哪里，车窗外始终是几乎一成不变的无边无垠的黄土地。武汉被称为“落雀之都”，听说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这儿的夏天热得连鸟雀都要坠落下来。当然，我去时还没热到这个程度。

访问武汉的正式目的是出席向武汉大学赠送一小批日语书籍的仪式，但我还暗自怀有另一个希望，那就是与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武汉大学的日语教师吴月娥女士再次相会。

吴女士去年 4 月曾来日本，并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我与她的相识其实有着这么一段机缘——整整两年以前，日中友好学生访华团去武汉大学访问，团员中有创价大学的学生，这位学生在那次访问中与吴女士相识，吴女士也因此在今后访日时访问了创价大学，并与我见了三次面。我们在一起进餐，打乒乓球，弹钢琴，共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刻，并成了朋友。

这次相会离那次相识已半年有余。我们一行一到武汉大学，就受到许多学生的欢迎，吴女士带着她的三个孩子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列。我们相互跑到一起握住手的那一瞬间，我心中涌起一阵阔别重逢的温情。

吴老师是一位活跃、开朗、爽直的女性。我深感由吴月

娥女士与一位日本学生的接触而开始的这种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在当代是非常可贵的。因为我相信：个人与个人之间自然接触的积累，就象那山下的广阔原野，有了它的支持，国与国之间真诚友好的山峰才得以巍然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之间交流的背后，有着各自国家民众的大海，这无数的细小交流好似互相倾注着自己的海水，汇成了友谊的海洋。我愿珍重这集流中的每一滴水珠。

说到这，我又想起了过去的一位中国留学生鲁迅和他的老师藤野先生。鲁迅作为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的唯一中国学生，既会遇到语言方面的障碍，再加身处那不一定算得上温暖的环境中，他该需要忍受怎样的孤独呀。有一次，教解剖学的藤野先生把鲁迅叫去，让他以后每周都把笔记带去，并替他用红笔一一做了添改。藤野先生的激励当时使鲁迅受到莫大的感动，并在鲁迅后来的一生中成为他胸中一盏不灭的明灯。

一位孤独的留学生与一位无名的教师之间这不起眼而又充满温情和真诚的交往，正是我所希求的交流的原型。这个故事写在小说《藤野先生》中。日本的藤野先生的名字也和革命作家鲁迅的名字一起，带着一种可敬可爱的意义，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我的思路又来了个小小的飞跃，想到了这种人际之间的交流实际上也是革命和变革所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革命既是坚韧的人类意志的一种实践，也必须具有足以打动人心的

深入交流，这种交流既可称作同志爱，也可称作友情。

在革命这种历史转换的戏剧背后，同志爱和友情自古以来便被人们传为美谈。在共同的思想目标和使命感的基础上产生一种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深刻的共感，这种共感必定有着一种深邃而又坚实的结合力，当它发展到最高峰时，便会爆发一种导致变革的能量，从而使历史的机轴发生变化。不过，当这种共感破灭时，一切也就都荒废了，就象变革取得成就后常有的那种“背叛”——友情和同志爱的沦丧——导致了一幕不应是人间所有的地狱场景。

我相信：只要不以人类所具有的永恒的尊贵价值为基础，这种由交流而产生的共感就不能使永恒的友谊得以确立。作为佛教徒，我的信念是：当你不把他人仅仅当作一种现世的存在，而是看作贯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世的存在时，自然便会看到人之生存所具有的稀有价值 and 意义。当你认识到自我存在的这种本相时，便应能抱着完全同样的敬畏之心看待他人的存在。如果将人的存在看作一种偶然的产物，就象浮在“现在”这道河流中的泡沫，那么也就难以产生那种于生命的深层发生共鸣的交流。

我想，只要在人与人相对而视的眼神里闪烁着这种透明的光亮，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可以互相信赖的关系。不论是现在的中国还是处于不断动乱之中的亚洲，今后在政治和社会形势方面还定会有许多曲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在与许多人的交往中，还几乎没有从他们的视线中看

到那种昏暗、浑浊的眼神。也许我这是过于乐观了吧。

根据我的信仰，我又进一步推断：人与人交往的最根本中心可以从师生关系中求得。如今一说到师生关系，人们就马上会从学校中的教师和学生这种极其有限的意义方面去考虑，而我却认为应当把眼光更放开一些，从人生这种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去考虑。事实上，那种靠权威而建立的师生关系，也因儒家思想的影响而陷入了单纯的礼节，成了一种陈旧遗物的形骸。人生中的师生关系则远比这种师生关系来得范围宽广、内涵丰富。我深感：当意识到这种广义的师生关系时，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关系就能处于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人们相互交往时，若能带着一种深邃的洞察力，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具有一种既互为师表，又互为弟子的关系，那么，友谊就能结出最丰硕的果实来。世上没有在所有方面都为人师的人，也没有在所有方面都必须作为弟子而学习的人。人与人之间在无意识之时便结成了一种既互为师表，又互为学生的关系。

我自己今天之所以超越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与许多人接触、交谈、保持着作为人的交往，并从中发现重大的意义和感到深深的喜悦，那仅仅是因为我坚信：基于这种本来的人际关系产生的友情所造成的交流，正是将和平之火点着于这动荡世界的引子。这固然也许始终只不过是一种引子或一个小小的发火点，但在这走入末途的人类世界，除了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具有强结合力的联系之外，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创造出具有价值的东西来。

今年4月，我们迎接了6位中国留学生来创价大学。我希望与这6位学生之间富有朝气的交流，能成为那种永恒的交往。

我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桌旁正好有一本杜甫的诗集，我正读到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的末尾写道：

自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读到这儿，我的心中又不免产生了一番新的感慨。

访问武汉时，我见到了长江的流水。1600米之长的武汉长江大桥固然壮观，但我却不能不更为桥下那长江流水所打动——该怎么形容它呢？悠长？浩渺？反正是宏大吧，并且还蕴蓄着一部波澜壮阔的人间史剧。当时，我突然又想起了杜甫诗的片断。

在武汉大学时，吴老师所教的日语专业的学生们给我们唱了一首《红蜻蜓》^①，分手时又赠送了一幅出自她们手工

① 著名的日本民歌

的刺绣作为纪念。我看着放在桌旁的刺绣，信由自己的思路所至，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些。

甚为自己的语无伦次而诚惶诚恐，但能在回国后的匆忙中给先生写信，竟还是令人愉快的事。草草不恭，尚祈海涵。

欣闻先生 5 月将作访华之行。谨颂玉体康健，一路愉快。

1975 年 4 月 28 日

触摸“永恒”

井上靖

薰风吹拂的5月，我坐在书斋的窗边拜读大函，得以了解您的近况以及此次中国之行的感受之一端，使我度过了一段很久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快乐时刻。

我已从报纸的报道得知您在北京会见西哈努克殿下下的消息。看到报纸说，您是金边解放后殿下会见的第一位日本人，我感慨万分，并认为这确实不是偶然的。

您作为一位自由的思想家，以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接触为基础，从这种接触所产生的结果中看到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并欲使之与动荡中的世界结合在一起；而柬埔寨那位意气风发的领导人则正处于旷日持久的内战行将结束的历史转折点。我想，他是把您的立场作为最可信赖、最富魅力的东西来接受的吧。

您在武汉大学出席日本书籍的赠送仪式的消息，报纸也

已有报道。我认为，文化交流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相当艰难。向中国的大学赠送大批日语书籍（据说有 3000 册）的工作，将在未来日中两国的友好史上结出何等丰硕的果实呀！听说我的著作也被收在这批赠书中，我感到非常高兴。

信中有关武汉大学日语教师吴月娥女士与一位访华日本学生的故事，以及由此联想起的鲁迅与藤野先生的交往，我都深有感触地反复读了。

我也坚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有别于政体和国体，而从人与人之间友情的交流出发。虽然有人认为政治是超脱于这种人际关系的一种更冷酷无情的东西，但我相信，既然政治要靠人去搞，那就不可能与人心无关。如果政治可以无视人类的真情以及人际关系中所具有的诚实，那么它对于现在这混沌的世界形势又能有何贡献呢？

去年秋天，《汉唐壁画展》在日本举行，展出期间，中国的王冶秋氏曾来日本。正如您之所知，王冶秋氏身居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要职，同时也是一位学者，作为中国古文物研究专家而闻名世界。

我每次访问中国，都要得到王先生的关照。他带我参观故宫博物院，并特殊照顾地让我看到想看的東西。每见一次面，我对他渊博的学识和温厚笃实的人品就更增添了一分敬重之意。

王先生抵日后的第三天，我和他见了面。当我问起他来

日本后最先见的是谁时，他回答说：到考古学家原田淑人先生的家里做了拜访。我当时虽不了解他与原田淑人氏的关系，却也觉得这种对访问对象的选择，确实是符合王冶秋氏的性格的。

王先生在日本待了几天后回国。此后不久，我从报纸上得知原田淑人去世的消息，颇为震惊，心想：王冶秋氏也许是访问原田淑人氏的最后一位外国学者了，幸好他们这次见了面。这事情虽然不大，他们那肯定是纯粹因学问而结合的关系到底有多深，我也并不了解，但我却为这件事情而受到了感动。

关于王冶秋氏，我还有一件事想告诉您，那是去年秋天，也就是他拜访原田淑人的那次访日时，托我的一件事情——

“日本可能会有山西省永宁寺的碑拓，这事由已故的内藤湖南先生在哪本书里提到过。我很想弄到那碑拓的摹件或照片。那块碑的背面刻着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

他的这番话当然是由翻译传达的。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对那东西的去处是毫无目标，也想不起有什么头绪可以帮着寻找，但我还是答应他尽力而为。

距那次见面后两个月，也就是去年年末时分，我在京都参加某杂志社举行的宴会时见到了长广敏雄氏（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当时，我突然想起了王冶秋氏所托的永宁寺碑拓一事，便与长广氏说了。长广氏说他也受过王冶秋氏的照顾，